

政

治

進步的三十年

程翰

讀完了中國近代史，從一百年前鴉片戰爭到今天對日抗戰，從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到正在進行的國民革命，誰也會想像十九世紀的中國和二十世紀的中國迥乎不同。我們已經跟着世界進化的潮流而邁步前進。尤其明顯的，是辛亥以前中國雖屢有農民暴動而沒有革命組織。雖間有革命意識的表現，而無正確的領導。最近三十年中，不但組織上不斷的有改良，認識上愈弄愈清楚，並且參加國民革命隊伍的人們，也愈來愈增加。這三項原是有連環性而互相影響。就因為如此，所以辛亥以後進步的成績，在質和量兩方面都是累積地加速起來。

一 辛亥起方才有革命，革命組織逐漸改善

距今百年前，中國民衆的痛苦已很普遍。外面有列強政治經濟的侵略，手工業開始崩潰，農家副業也隨之凋敝。國內受滿清專制的壓迫，政治腐敗，肆行貪污，中央官吏與地方官吏相互勾結，而州縣官吏更剝削小民以奉承上司。於是高利貸盛行，而土地權集中，農民無路可走，漸萌暴動情緒，因此演出太平天國一段歷史。

太平天國時的農民暴動，分播到十六省之廣，前後有十五年之久。用粗笨武器的農民在這個期間曾經佔據過六百餘縣城，可稱為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運動了。和太平天國同時出演的農民運動，還有捻匪的變亂，江

蘇安徽山東三省有東捻，河南湖北陝西有西捻。至於以杜文秀為首領的雲南回變，也是要求民族平等民生改善的一個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差不多和洪楊是同時爆發，但經過十八年方才平息。這十八年內雲南人口至少減去三百五十萬。洪楊以後緊接着又是西北的回變，波及於陝甘新三省。迪化附近的人口在回變前有二萬四千戶光景，回變後只剩下六千餘戶。戰爭和流亡的劇烈即此可以想見了。

十九世紀末年，山東南部發生民變。江蘇安徽等地蔓延着哥老會的組織。直魯豫三省農民又有大刀會的組織。這些宗法觀念很濃厚，並且依據迷信而結成的農民集團，激於列強的凌辱憤於內政的腐敗，樹起扶清滅洋的旗幟而大起騷亂，於是有義和團之變。可是從太平天國起到義和團止，只見一連串五六十年的農民暴動，未見有什麼革命組織。中國的革命組織胚胎於辛亥時代，而同盟會即革命組織的雛型。孫中山先生被稱為國父是很有道理的。

農民暴動的目的不在乎創立民主，因此農民自身的組織也只是摹倣傳統的專制。沒有進步的民主精神。無論洪楊也罷，回亂也罷，義和團也罷，都是尊奉帝制而不講民主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所發動的變法維新運動，也不願意推翻專制，不過想在皇帝統治之下，零碎的施行若干新政罷了。正因為不講究民權，不擁護民主，所以這些農民或士大夫的組織，在表面似乎嚴密，

實際卻很散漫，基礎也不會廣太。這都是由於沒有共同奮發，共同遵守的一貫主義，所以也不會有共同活動的一致張本。

孫總理於辛亥以前五年，早就在海外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革命同志。他有一貫的思想線索，做行動的綱領。但同盟會的組織，分子複雜，缺點甚多。後來一再改組，淘汰落伍腐化分子，而吸收收進進步青年黨員，才成立民十三年的中國國民黨。從此革命的組織更能普遍於各地和各階層，而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或全民革命，獲得了較完備的組織。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的組織方針，是要號召國內一切革命的團體，站在國民革命旗幟下來參加聯合戰線。民十六年北伐所以有相當的成績，主要是憑藉了這個聯合戰線的基礎。

國共分裂而革命的聯合戰線中斷以後，在國共對立的十年中間，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集團在組織上都有着相當進步。因為環境壓迫的關係，組織更加嚴密。又因為嚴密的緣故，意識更易團結。這種進步，在革命的集團方面當然更是顯明。現在國共重新聯合起來，共同擔負抗戰建國的重任，又已在三年以上了。一般民衆很迅速的覺悟，要完成抗建工作而達到國民革命的使命，惟有努力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線，不爲反革命聯合陣線如汪精衛那樣口組織所欺騙。這一種普遍的覺悟，就是鞏固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磐石。而這個聯合戰線的延長下去和充實起來，也便表示中國革命組織的繼續改善。

二 北伐時喚醒了民衆，革命性質已被認識

這二十年來不但革命組織的本身大有進步，就是一般民衆對於革命性質的認識也愈加正確。辛亥時期大多數的革命先進分子，以爲完成了議會的組織，摹倣到了民主的形式，就有實行三民主義的希望。那知因此卻上了袁世凱的當。一面高築對於議會政治的幻想，一面卻解散了自己的革命政黨。從所謂二次革命起直到民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成立，在這十年工夫裏，軍閥割據，橫征暴斂，使中國民衆得着一個很大的教訓，覺悟到粉飾政治的絕不可靠，而虛偽的民主終於要被少數獨裁者所假借利用，以爲賊民的工

具。所以北伐時代創立黨權高於一切的口號，由黨的力量動員了一般民衆，尤其是鄉間的農民，將農民組織起來，積極向革命大道奔馳。最近十年來，更加深切的認識了要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非憑藉着革命的政黨和各革命政黨的大集團不可。

抗戰以後，從淪陷區和游擊區的經驗，從民衆勢力能夠組織自衛和禦敵的經驗，更加證明革命的力量不是由上而下，乃是由下而上的。在這些區域中，純潔的青年大批武裝起來了，虛偽貪污的政客不容易躲藏了。因此比較那些還沒有動員的地方，更能切實執行民權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政治設施。也就昭示着政治高於經濟，民權先於民生的實例。全國民衆漸漸的會明白，如果政治不改善，那就沒有希望可以解決許多日常的生活問題。

民生問題決不是單純的增加生產問題，因爲如果要增加生產，必需先調整生產關係。土豪劣紳握不到政權的地方，租稅卻容易減少，利率也容易降低，壟斷囤積居奇等事，更易於消滅。所以人們得以安心努力生產，而生產額才可以向上增加，反之，凡有土豪劣紳勢力穩固而操縱政權的區域裏，租稅名爲減少而實則增加。他們甚至從一切兵差徵發中漁利中飽，或竟至於公開勒索。這些地方在上者爲所欲爲，在下者幾乎忍無可忍，農民安得專心於生產事業？生產額又如何能增加呢？

現時華北許多縣份，因爲民衆動員，民衆武裝，民衆能夠自衛而且自治，所以地方行政上舊的結構已被改組了。無疑的在政治民主化以後，軍事上會增添新的力量，經濟上也有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此可以走上民主主義的大道，只有這些地方，我們可以說是一「經濟趕不上政治」。換言之，生產關係已有相當的改善，現在只求生產有配合的增加。至於大後方許多區域，目前還是「政治趕不上經濟」，就因爲行政結構還未改組，而生產關係依然如故，所以生產增加既談不到，生產品的流通也受到阻礙了。

最近的米價問題，就能夠明顯的證實了生產關係比增加生產更爲重要。政治的清明更先於經濟的改善。中央農業實驗所對於糧食問題，素極注意，對於米糧產銷情形有翔實的統計。據該所副所長沈宗瀚君談稱：「本年各省米糧生產頗爲豐富，並無供不應求之虞，近日米價飛漲情形，實係一時

變態現象，全由人爲所致。……一般有糧者不應囤積居奇，以致造成此種畸形現象。」（香港大公報十一月三十日）須知不應做壞事，是一個道德問題，能不能制止人家做壞事，是一個實力問題。沒有民衆的勢力，沒有民主的權威，如何有實力來解決一切重大的民生問題呢？儘管還有少數人仍舊以爲戰時中國的經濟問題，主要在增加生產，而只是在必要的限度內改變生產關係，大多數人卻已深深覺悟到，政治良善以後，經濟方有辦法，而民生問題的解決，主要還是在改變生產關係，這個關係改變了，才能希望增加生產。

正因爲處於當前的局面，政治重於經濟，所以民族獨立以求政治上的解決，其迫切性更甚於階級鬭爭，博取經濟上的平等和自由。近代史中有政權獨立而經濟還須依附於人的國家，例如十九世紀的美國，或大革命以前的帝俄。可是政權不獨立主權不完整的國家，從未能自由發展它的經濟，達到經濟獨立而享受最優美條件的生活者。辛亥時代中國尚無近代工業的萌芽，一般擁有資產者都抱着政治由它變化，只要有財可發的態度。最近二十年來，特別是抗戰以後，我們的企業家民族資本家逐漸明瞭了今日的問題對外重於對內，政治獨立先於經濟自由，民族解放更急切於產業發展。這一個認識，也就是在抗戰建國中，造成國民革命聯合陣線的基礎。

三 抗戰後民族得解放，革命基礎正在擴大

民國成立三十年來，物質方面的進步正也不少。熱水瓶，電燈泡，打字機，發電機等等，以前中國人不能製造的，現在能夠製造了。婦女當律師，做參政委員，就表示着制度上的進步。數百種鉛印報紙，數百種油印報紙，數千種壁報，確能代表一般教育的進展。可是因爲國民革命已成爲各種物質的和精神的進步以及各項事業發展的先決問題，我們應該承認，辛亥以後最根本的進步，便是革命組織的改善和革命意識的推進。這樣的進步很顯明的，很具體的，在革命隊伍的繼續擴大中，表演出來了。

國民革命的目的，從抗戰建國四字可以正確的推論出來。簡言之，就是要建設一個統一的，近代化的，真正民主的中央政府。外以抵禦列強的侵略，

內以發展產業而安定民生。北伐以前十年間，北洋軍閥各據一方，因爲搶奪刮削民脂民膏而連年發生內戰。北伐以後，東南一隅也僅僅樹立了一個雛形的中央政府。但最近十年來，中央政權迅速伸張。到了抗戰時候，竟造成全部統一的局面。這樣政局的統一，即是革命基礎擴大的演進。

革命既要靠民衆，民衆尤須依仗武裝。但以前中國的軍隊大部分是含有僱傭性質的土匪，流氓，城市失業者，和破產的農民。北伐時代軍隊中採用政治訓練的制度，因此軍人對於國家觀念的認識，逐漸有了進步。軍隊中政治的工作，在國共對立的十年間更形積極。到了抗戰開始，一致對外，民族意識怒發，而軍隊的進步也更日益顯著。脫離民衆的書生政客們，像汪兆銘，陳公博，周佛海等，都很容易走上反革命的歧途。他們只能利用土匪流氓和一般無聊的墮落的知識份子，所以他們組織的偽軍沒有自動的戰鬪力。軍閥也是不會堅決抗戰的，像私通日人的韓復榘也已經伏法了。現在大部分的中國軍人，已在戰爭中間磨鍊出一種純潔的國家觀念或民族意識。同時土匪流氓的成分，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真正善良的農民成分，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

目前成千成萬的中國農民，在經濟上自己知道毫無出路。他們加入軍隊對日人作戰以後，更覺悟到須要抗戰得着最後勝利，首先保障了中國民族的獨立地位，方才可以希望找尋生活的辦法。他們都漸漸明白，軍閥政客都有暗中投降日人的危險。如果要殺退日人，只有靠着革命的領導和自身的努力。因此日人的軍隊反而漸漸的僱傭化，我們的軍隊很快的脫離了僱傭性質。這是一方面表現敵軍愈戰愈弱的理由，一方面也是說明我們國民革命正在擴大的情形。

北伐時代許多自命爲革命理論家的人，稱道中國革命的高潮而歸束於長江一帶和華南各省佃農的富有革命性。甚至推論到華北的所以不能有革命的高潮，便是因爲自耕農的成分太多。抗戰以後，華北游擊區的發展，地方政治的革新，足以粉碎這種錯誤的理論。同時也是證實國民革命的基本確正在擴大和充實起來。以前這種理論的錯誤，發生於對我國佃農和自耕農經濟比較地位的不正確觀念。在許多國家裏，如德國如丹麥，一般佃農的

地位趕不上自耕農。而在英美兩國好些地方，經營較大的佃農反比小自耕農地位來得優越。中國的情形比英美丹德完全不同。我們華南華中的佃農固然很貧窮。華北的一般自耕農種三十畝以上的，還佔少數。因此也一樣很貧窮。北方自耕者和南方的佃戶，在經濟上既是同處於低落的地位，他們意識中對於革命的要求，是沒有分別的。現在中國農民，不論南北，都已大批加入國民革命的武裝隊伍。這不能說不是一種很進步的現象。

政治問題的基本條件

政治問題，通常分兩方面，一方面是「理論政治」，一方面是「實際政治」。理論是政治運動的指南，實際政治是政策實行的方式，這兩方面都有牠的功用。假如一個政黨專門注重理論政治，牠也許可以博得思想界的同情，但是在建設處置的時候，一定會發現許多想像不到的障礙。在另外一方面，假如一個政黨專門注重實際政治，牠也許可以得着大多數民衆的歡迎，但是在時代潮流轉變的時候，牠一定缺少未雨綢繆的遠見。

所以理論政治和實際政治，應當相輔而行，不可偏向。

民國成立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中間經過無數的政治運動，如像復辟運動，聯省自治，武力統一，共產主義，國家主義，國社主義，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然而仔細觀察，這些政治運動，都是偏向於理論方面，對於中國實際的政治，沒有仔細合理的辦法，所以雖然每一個運動，都有文人策士，替牠們說得天花亂墜，結果還是一塌糊塗。國家民族的命運，愈陷於危險的地位。北伐成功，政府用全力宣傳三民主義，在理論方面，總算已經作到婦孺皆知了。在實際方面，當然有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然而因為情勢的關係，有許多計劃，一時不容易實現。

在實際政治中間，有兩個基本條件，無論任何政黨，無論主張任何理論，一、有力量的時候，就必須得儘先實行，如果不能實行，牠的地位，就要根本搖

回溯近百年的國史，從清廷包辦的南京條約，到最近漢奸集團扮演的對日「和平條約」，中國的進步已很明顯了。以前是對外真屈服，目今是對日真抗戰。辛亥以來三民主義大放光彩，而革命組織逐漸改善，革命性質漸被透認，革命羣衆迅速擴大。如此更有累積進步的趨勢，以至於戰建大業的完成。

陳 銓

動，對內不能統治，對外更不能抵抗。這兩個基本條件，看起來很簡單，實際上很重要，第一個是「愛民」，第二個是「養士」。

通常信仰民主主義的人，總喜歡想像，民主主義是以民衆的意志為根本，政府需要愛護民衆，纔可以得到民衆的擁護。獨裁政治，卻是以少數領袖的意志為根本，他們用不着替民衆作事情，他們對民衆可以無情地壓迫。這真是大錯特錯之見。世界上無論什麼形式的政府，沒有民衆的擁護，絕對不能成功，不替民衆謀福利，也絕對不能夠得到民衆的擁護。這差不多是一切政治理論上的天經地義。不用說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就是古代的君主專制，對於這一點也同樣不能看輕。漢高入關中，首先就是約法三章，所以當時民心歸向。秦始皇雖然用超越的武力，統一天下，卻匈奴七百餘里，然而他成功之後，驕奢殘殺，所以身死不久，天下揭竿而起。一部二十四史中間，每一個朝代的興亡，差不多都可以應用這一個原則。中國歷史家最喜歡講「天意」，其實天意就是民心，民心的向背，就是天意的向背。

假如在君主專制之下，都不能取得民衆的同情，那麼在近代政治之下，那一種政治形式，又能夠違背這一條基本原則？英美民主主義國家，事事有一定的方式，來取得人民的同意，不敢作違背民意的事情，固然討得人民的喜歡。就是蘇聯、德意獨裁國家，雖然政治上的方案，不一定事事徵求國民的